

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与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吴丽娜 纪莉莉 万娇娇 李雅爽 赵俊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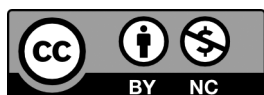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开封

摘要 | 目的：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安全感量表、青少年感恩量表和亲社会倾向量表对 572 名青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和亲社会行为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感恩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且领悟社会支持在二者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3）心理安全感对中介过程“感恩→领悟社会支持→亲社会行为”的后半路径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结论：感恩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还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心理安全感在感恩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关键词 | 青年；感恩；亲社会行为；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影响了我国居民的身心健康以及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给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2011 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民众能否积极主动地实施亲社会行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志之一；并鼓励社会各界对增加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同时报告还强调了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与增强民众安全感的重要性^[3]。另外，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过程中，我国青年群体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探索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为有效提升青年亲社会行为提供科学依据，对培养青年积极社会心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通讯作者：赵俊峰，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河南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教授，E-mail: jfzhao63@hotmail.com。

文章引用：吴丽娜，纪莉莉，万娇娇，等。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与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J].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1, 3 (1): 58-67.

<https://doi.org/10.35534/pc.0301009>

已有研究表明,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不同个体的行为表现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比如,有些个体在经历逆境或者创伤性事件(如地震)后表现出较多的攻击性行为^[4, 5];而有些个体却更愿意帮助他人^[6]。这一行为反差促使我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人们在处于负性事件时仍然做出亲社会行为?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这与人们具有的积极道德情感——感恩有关^[7]。2.0时代的积极心理学强调以辩证的视角研究积极与消极之间的联系,认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人们应该关注如何从消极态势中衍生出积极因素^[8],而感恩作为能够减轻心理病理症状以及增加主观幸福感的力量之一,对身处于消极状态下的人们至关重要^[9]。

感恩指个体对他人的恩惠或帮助产生感激并进行积极回应的一种情感倾向^[10, 11]。道德情感理论认为感恩具有亲社会性质,是建立在他人对自己帮助的体验之上,是对他人自己所做贡献的一种回应^[10];该理论还认为具有高特质感恩的受益者往往会伴随更强烈的感恩体验,从而激发其对帮助者甚至陌生人实施亲社会行为。这一理论得到了以往研究的证实,如:王文超和伍新春通过对灾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发现灾后得到帮助的青少年会对助人者产生感激之情,从而促使其实施更多的亲社会行为^[6]。值得注意的是,感恩既能促进受益者做出亲社会行为,同时也有利于助人者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比如:Grant和Gino研究发现^[7],当助人者被表达感谢时,会体验到更强的社会价值感,从而激励他们实施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感恩是影响亲社会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是大多是在探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12],较少探究感恩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因此,基于以往的研究,提出假设H1:感恩能够正向预测青年亲社会行为。

通过对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行探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领悟社会支持指个体在他人(亲戚、家人、朋友、同事等)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基本社会需求(从属关系、情感、归属、身份、安全和认可)得到满足的程度^[13]。关系调节理论(Relationship Regulation Theory, RRT)认为,个体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与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人们通过富有情感的日常对话与互动领悟到来自社会的支持,从而调节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为^[14]。一方面,具有高特质感恩的个体更容易看到他人对自己的帮助^[10],从而促使个体更容易地领悟到来自社会的支持^[15];另一方面,社会交换理论认为^[16],人们之间的交往遵循互惠原则,当个体感受到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时,就会倾向于在行动上(如:亲社会行为)支持他人。以往相关研究已经证实感恩可以正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水平^[17];同时,具有高社会支持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18]。因此,提出假设H2: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与青年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安全需要是指人们对稳定、安全的环境以及被保护的感受的一种需要,它能帮助个体消除恐惧和焦虑^[19]。当个体的安全需要基本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对稳定的社会交往与亲密关系的需求。情绪安全感理论在探讨亲子冲突对儿童安全感的影响时指出^[20],安全感遭到破坏的儿童会形成并将消极的认知图式扩展到新的社会环境中,导致其在面对新奇的、有压力的或有挑战性的环境时,选择通过逃避社交行为来减少焦虑和恐惧,因此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据此,提出假设H3:心理安全感能够调节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解释具体的作用机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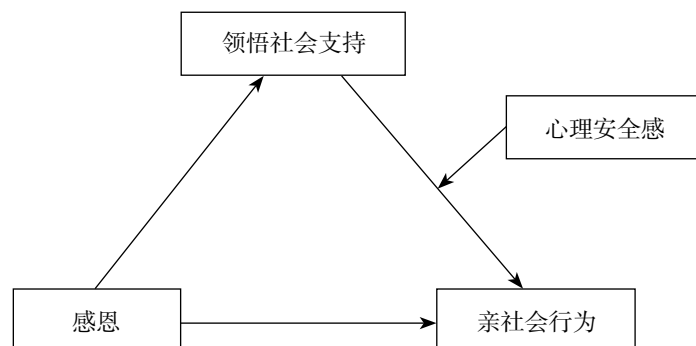


图1 假设模型

Figure 1 Hypothesis model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针对我国青年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 623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572 份，有效率达 91.81%。其中男性 222 人（38.8%），女性 350 人（61.2%）；单身 262 人（45.8%），已婚 310 人（54.2%）；现居住地为农村 187 人（32.7%），县级城市（含县级市）137 人（24.0%），市级城市 248 人（43.4%）；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 154 人（26.9%），大专 93 人（16.3%），本科 269 人（47.0%），研究生 56 人（9.8%）；全日制学生 167 人（29.2%），体制内工作人员 156 人（27.3%），私企工作人员 92 人（16.1%），务农人员 52 人（9.1%），其他 105 人（18.4%）。被试年龄在 18—44 岁之间，平均年龄 28.47 岁（SD=6.11）。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姜乾金^[21]修订，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 3 个维度，12 个项目。7 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领悟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2、0.85、0.87、0.82。

2.2.2 心理安全感量表

该量表由丛中、安莉娟^[22]编制，包括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 2 个维度，16 个项目。5 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安全感水平越高。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3、0.87、0.89。

2.2.3 亲社会倾向量表

该量表由 Carlo 和 Randall 编制，寇彧等人^[23]翻译修订，包括 6 个维度公开的、情绪性的、依从的、紧急的、匿名的和利他的，26 个项目。5 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亲社会行为倾向越高。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4、0.80、0.83、0.84、0.75、0.84、0.80。

2.2.4 青少年感恩量表

该量表由何安明、刘华山和惠秋平^[24]编制，包括对社会恩惠、自然恩惠、他人恩惠的感知和体验与对社会恩惠、自然恩惠、他人恩惠的表达和回报6个维度，23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感恩程度越高。基于青年人的特点，对量表中的部分项目进行了修改，如将原量表中的“老师”改为“老师、领导、长辈”，“学校”改为“学校、工作单位”。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0、0.82、0.72、0.78、0.74、0.82、0.8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一些措施（如匿名性作答、设置反向计分项目等）进行事前控制；并在事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结果表明：未经旋转时，12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公共因子仅能解释26.29%，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我国青年的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和亲社会行为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57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N=572)

变量	<i>M ± SD</i>	1	2	3	4	5
1 感恩	91.25 ± 11.63	1				
2 领悟社会支持	60.16 ± 11.70	0.55***	1			
3 心理安全感	53.75 ± 12.75	0.33***	0.38***	1		
4 亲社会行为	95.98 ± 14.65	0.61***	0.47***	0.09*	1	
5 婚姻状况	—	0.13**	0.14***	0.24***	0.07	1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下同；婚姻状态为虚拟变量，单身=1，已婚=2，下同。

结果显示：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两两存在显著正相关。婚姻状况与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感恩（ $t = -3.01$ ， $p = 0.003$ ）、领悟社会支持（ $t = -3.42$ ， $p < 0.001$ ）、心理安全感（ $t = -6.01$ ， $p < 0.001$ ）在不同婚姻状况下差异显著，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其他人口学变量不予控制。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揭示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在控制婚姻状况的条件下，将各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

后代入回归方程^[25]，并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3.3 版本）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26]。

结果表明（见表 2）：感恩可直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beta = 0.61$, $p < 0.001$ ）；放入中介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后，直接效应依然显著（ $\beta = 0.50$, $p < 0.001$ ）。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检验表明，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 $\beta = 0.11$, 95%CI = [0.05, 0.1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0.61）的 18.03%。这表明感恩既可以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又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间接作用影响亲社会行为。

表 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est

变量	方程 1 亲社会行为		方程 2 领悟社会支持		方程 3 亲社会行为	
	β	t	β	t	β	t
婚姻状况	-0.01	-0.22	0.15	2.11*	-0.04	-0.66
感恩	0.61	18.09***	0.54	15.32***	0.50	12.86***
领悟社会支持					0.19	4.95***
R^2	0.37		0.31		0.39	
F	165.71***		125.63***		123.20***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下同；连续变量标准化处理，下同。

其次，为进一步检验心理安全感在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影响亲社会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起着调节作用，本研究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3.3 版本）组件模型 14 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预测变量	领悟社会支持			亲社会行为		
	β	SE	t	β	SE	t
婚姻状况	0.15	0.07	2.11*	0.01	0.06	0.20
感恩	0.54	0.04	15.32***	0.50	0.04	13.04***
领悟社会支持				0.26	0.04	6.60***
领悟社会支持 × 心理安全感				0.15	0.03	5.33***
R^2	0.31			0.45		
F	125.63***			91.79***		

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安全感的乘积项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beta = 0.15$, $p < 0.001$ ），说明心理安全感在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即心理安全感调节了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判定指数 Index 为 0.08，置信区间为 [0.04, 0.12]，不包含 0，再次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

当调节变量为连续变量时，通过 Johnson-Neyman 法（简称 J-N 法）^[27] 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可以克服选点法只能选择有限取值的缺点^[28]，故进一步采用 J-N 法对心理安全感调节领悟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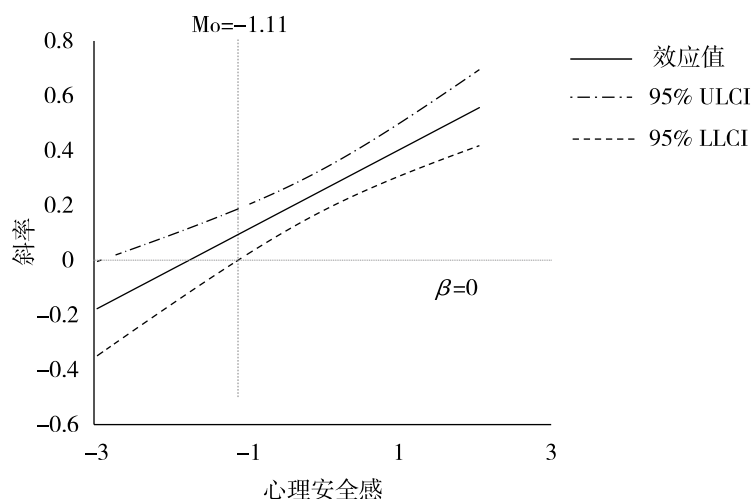


图 2 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分析

Figure 2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注：横坐标是调节变量心理安全感，纵坐标代表回归系数（即斜率）的变化。

结果表明，当心理安全感的标准分数取值范围为 $[-1.11, 2.06]$ 时，置信区间不包含 0，简单斜率显著。也就是说，当心理安全感高于 -1.11 时，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效应显著，且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随心理安全感的增强而增强。

最后，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心理安全感调节作用的实质，进行条件中介效应分析。如表 4 所示，当心理安全感水平高（ $M+SD$ ）时，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显著（ $\beta=0.22$ ，95%CI = $[0.14, 0.30]$ ）；当心理安全感水平低（ $M-SD$ ）时，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beta=0.06$ ，95%CI = $[-0.003, 0.12]$ ）。由此可见，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大小以及中介作用显著与否均与心理安全感（调节变量）的取值有关，即本研究所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如图 3 所示）。

表 4 不同心理安全感青年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you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ecurity

心理安全感	β	BootSE	Boot 95% CI	
			LL	UL
$M-SD$	0.06	0.03	-0.003	0.12
M	0.14	0.03	0.08	0.20
$M+SD$	0.22	0.04	0.14	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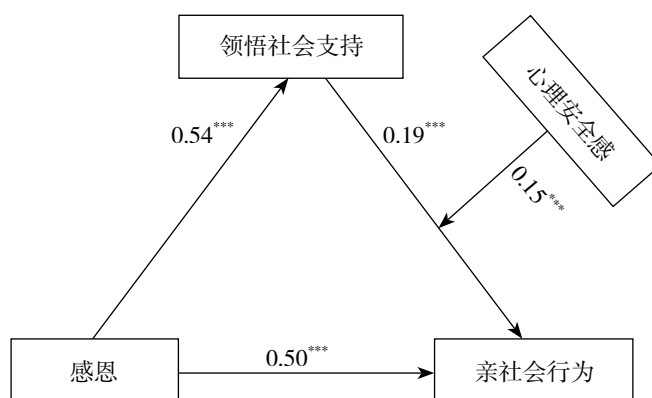


图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Figur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4 讨论

本研究根据道德情感理论、关系调节理论、需要层次理论和情绪安全感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考察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感恩影响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假设 H1 成立。以往研究也证实了该结果，如：Tsang 和 Martin^[29]通过探讨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个体接受帮助之后会增加其亲社会行为，并且这种影响是由于感恩的作用引起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小学生感恩水平与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正相关，且感恩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表明具有高感恩特质的小学生更愿意帮助他人^[30]。这一结果符合社会交换理论^[16]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价值观念，并可以通过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10]进行有效的解释，该理论认为感恩本质上起源于亲社会行为，是当具有高特质感恩的个体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善意后进而产生想要回报帮助者的想法，甚至把亲社会意愿泛化到陌生人的身上，从而表现出了较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进一步分析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间接作用，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说明研究假设 H2 成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个体具有高的感恩水平时，更容易感受到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帮助，从而增强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而产生强烈的亲社会行为倾向^[12]。根据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感恩作为一种积极道德情感，可以通过扩展个体的知觉、思维和行为模式，建立积极持久的个人资源（如：健康、友谊、心理弹性、社会支持等）^[31]，从而促使个体做出有利于生命延续的行为（如：亲社会行为）。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得到了以往部分研究的支持^[6]。本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不仅验证了感恩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提醒人们要多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交流，多给予身边人甚至陌生人肯定、理解、帮助与支持，努力营造互相帮扶、共渡难关的家庭氛围与社会氛围，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心理安全感调节了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虽然在高低心理安全感水平上，领悟社会支持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均显著，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具体表现为当青年具有高安全感水平时，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更强，即对于高安全感的个体来说，亲社会行为随着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增强而增强的幅度较大。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H3 并与情绪安全感理论^[20]相一致，当个体的心理安全感水平较低时，往往伴随较高的社交焦虑^[32]；而具有高社交焦虑的个体会对社交场合充满恐惧，同时妨碍个体积累心理资源^[31]，致使他们较难领悟到来自社会的支持，并为了较少焦虑的发生而选择逃避社交活动^[33]，从而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次调查虽然进行了匿名化、增加测谎题以及删除答题时间过长或过短的问卷等处理，但是主观报告的方式可能会使数据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而出现误差，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增加他评的数据收集方法，来弥补自评方法的不足；其次，由于受疫情的限制，本研究采取网络收集调查问卷，无法控制被试答题时是否受到来自环境的干扰，从而降低答题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行为实验的方法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 [1] 何元庆, 连榕, 全莉娟. 积极社会心态: 正念培育的目标、机制与途径 [J]. 心理科学, 2019, 42 (2): 463-469.
- [2] 陈雪峰, 傅小兰. 抗击疫情凸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35 (3): 256-263.
- [3] 王俊秀, 杨宜音.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4] 金童林, 乌云特娜, 张璐, 等. 社会逆境感知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 反刍思维与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0, 36 (4): 414-421.
- [5] Zhou X, An Y, Wu X. Longitudinal Linkages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nd Violent Behavior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Following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J].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017, 26 (3): 231-243.
- [6] 王文超, 伍新春. 共情对灾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感恩、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学报, 2020, 52 (3): 307-316.
- [7] Grant A M, Gino F. A little thanks goes a long way: Explaining why gratitude expressions motivate prosocial behavior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 98 (6): 946-955.
- [8] Wong P T P. Positive Psychology 2.0: Towards a Balanced Interactive Model of the Good Life [J]. Canadian Psychology, 2011, 52 (2): 69-81.
- [9] Jans-Beken L. The dialectic dynamics between trait gratitud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sychopathology across 30 weeks [J].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2019, 32 (3-4): 502-515.
- [10] McCullough M E, Emmons R A, Tsang J-A.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 (1): 112-127.
- [11] 郑裕鸿, 范方, 喻承甫, 等. 青少年感恩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关系: 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27 (5): 522-528.
- [12] Yu G, Li S, Zhao 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Roles of

- empathy and gratitude [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20, 101: 104319.
- [13] Dueñas J-M, Fernández M, Morales-Vives F. What is the protectiv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religiosity in suicidal ideation in young adults? [J].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20, 147 (4): 432-447.
- [14] Lakey B, Orehek E. Relational regulation theory: a new approach to explain the link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1, 118 (3): 482-495.
- [15] Wood A M, Joseph S, Maltby J. Gratitude uniquely predicts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cremental validity above the domains and facets of the five factor model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5 (1): 49-54.
- [16] Cropanzano R, Mitchell M 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31 (6): 874-900.
- [17] Mirnics Z, Hittner J B, Swickert R, et al. Gratitude and social support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mood: A cross-cultural replication study [J].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20: 135910532094638.
- [18] 李温平, 郭菲, 陈祉妍. 社会支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链式中介模型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 (4): 817-821.
- [19] Maslow A H. Higher and lower needs [J].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48, 25 (2): 433-436.
- [20] Davies P T, Sturge-Apple M L. Advances in the formulation of 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an ethologically based perspective [J].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 Behavior*, 2007, 35 (3): 87-137.
- [21]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22] 丛中, 安莉娟. 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 18 (2): 97-99.
- [23] 寇戎, 洪慧芳, 谭晨, 等. 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的修订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 23 (1): 112-117.
- [24] 何安明, 刘华山, 惠秋平. 基于特质感恩的青少年感恩量表的编制——以自陈式量表初步验证感恩三维结构理论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2, 30 (2): 62-69.
- [25] 温忠麟, 叶宝娟.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 竞争还是替补? [J]. *心理学报*, 2014, 46 (5): 714-726.
- [26] 方杰, 张敏强, 邱皓政.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和效果量测量: 回顾与展望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2, 28 (1): 105-111.
- [27] Hayes A F, Matthes J. Computational procedures for probing interactions in OL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SPSS and SAS implementations [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09, 41 (3): 924-936.
- [28] 方杰, 温忠麟, 梁东梅, 等. 基于多元回归的调节效应分析 [J]. *心理科学*, 2015, 38 (3): 715-720.
- [29] Tsang J-A, Martin S R. Four experiments on the relational dynamics and prosocial consequences of gratitude [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9, 14 (2): 188-205.
- [30] Wu H T, Tseng S F, Wu P L,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mong Fifth-and Sixth-grade Students: Gratitude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J]. *Univers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6, 4 (10) : 2361-2373.

- [31] Fredrickson B L, Branigan C. 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attention and thought-action repertoires [J] . Cognition & Emotion, 2005, 19 (3) : 313-332.
- [32] 黄亚梅, 许慧, 顾红磊, 等. 班级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与高一新生社交焦虑: 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J]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 (4) : 853-856.
- [33] Chen J, Short M, Kems E. Interpretation bias in social anxie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0, 276: 1119-1130.

The Effect of Gratitude on Youth's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diate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he Moderat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Wu Lina Ji Lili Wan Jiaojiao Li Yashuang Zhao Junfe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Methods: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572 young people are investigated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security questionnaire (SQ), adolescent gratitude scale (AGS) and 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PTM). Of these, there are 222 males (38.8%) and 350 females (61.2%); 262 are single (45.8%) and 310 are married (54.2%); and the average age of the subjects is 28.47 years (SD = 6.11). Results: (1) The direct effect value of gratitude on prosocial behavior is 0.50 (95% CI: 0.43 ~ 0.60); (2) The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s 0.11 (95% CI: 0.05 ~ 0.16); The total effect is 0.61,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 for 18.03% of the total effect; (3) Psychological security regulates the latter half of the intermediary process of gratitude influenc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a=0.15, p<0.001$). Conclusion: Gratitude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prosocial behavior,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ompared with the youth with low psychological security,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f the youth with high psychological securit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osocial behavior.

Key words: Youth; Gratitude; Prosocial behavior;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security